

中国区域发展新空间识别研究

常瑞祥¹, 安树伟²

(1. 山西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0;

2.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070)

摘要:区域发展新空间的识别研究是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的重要基础。基于区域发展新空间的内涵与特征, 按照识别经济增长速度快的区域、识别经济增长动力足的区域、确定以地级市为基本单元的区域发展新空间、分析区域发展新空间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确定以城市群或都市圈等为基本单元的区域发展新空间等步骤, 最终识别出 3 种类型的区域发展新空间。未来发展中, 第一代区域发展空间以高质量发展为主, 第二代以空间结构优化和产业功能提升为主, 第三代以培育发展能力为主。

关键词:区域发展新空间; 新空间识别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566(2022)10-0072-11

Research on identification of the new spa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CHANG Ruixiang¹, AN Shuwei²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0, China;

2. College of Urban Econom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Abstract: It is important for expanding the new spa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to identify new space.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space,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five steps to eventually identify three types of new spa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First of all, identify the faster economic growth area; secondly, identify the power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gain, determine the prefecture level as the basic unit of the new district development space; and then, analyze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space; finally, determine with city or metropolitan area as the basic unit of the new spa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space will focus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second generation will focus on spat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industrial function improvement, and the third generation will focus on cultivating development capacity.

Key words: the new spa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new space identification

经过改革开放后 30 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 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 逐步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根据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发达

国家经济增长峰值水平变动轨迹判断, 未来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趋缓,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格局将无法保持现有态势延

收稿日期: 2021-12-24 修回日期: 2022-09-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C016); 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9W055)。

作者简介: 常瑞祥(1984—), 女, 山西襄垣人, 山西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

续,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国土安全、资源和生态环境保障等目标面临多重困境。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挑战,《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用发展新空间培育发展新动力,用发展新动力开拓发展新空间”。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必然成为关系到全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在准确把握区域发展新空间基本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识别出新空间,是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的重要基础,也是发挥区域发展新空间功能过程中需重点关注的科学问题。区域发展新空间的识别结果,对于全国形成区域发展空间梯次推进的发展格局,以及制定与实施区域空间发展总体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不同类型的区域进行了识别。总体上,这些有关区域识别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对各种问题区域的识别研究。如龚勤林等^[1]构建了“两步法”指标体系对问题区域进行识别;王婧等^[2]从人口密度分布、人口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综合素质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确定了人口发展问题区域的识别标准;孙丹等^[3]通过对经济增长动力与效率进行双变量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识别了3类经济增长的问题区域;时卫平等^[4]采用一般指标识别与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识别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问题区域。二是对一些特殊区域的识别。如段华平等^[5]通过聚类统计和敏感性评价对常熟市农业和农村污染优先控制区域的识别;张倩等^[6]以空间通达性的定量测算为基础初步识别出空间上集结的城市集群,进而得到城市群空间分布及其区划界线;高晓路等^[7]通过分析城镇之间的空间关系,对区域城镇空间格局的定量化识别;虞虎等^[8]基于构建的包含多个关键指标的综合评价模型,结合生态地理区划、生态功能区划等因素对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的潜在区域识别;潘方杰等^[9]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和生态敏感性评价方法,对县域单元微观尺度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空间识别。关于中国区域发展

新空间识别的研究相对较少。安树伟^[10]根据空间连续性和政策延续性等原则,初步识别了新战略性区域和潜在新战略区域;侯永志等^[11]运用工业化率和城镇化率两类指标对中国285个地级市进行筛选,识别出38个潜在战略性城市。

综上所述,现有关于区域发展新空间识别的研究,对新空间的识别并非建立在清晰界定“区域发展新空间”概念的基础之上,识别出的区域被称为战略性区域或战略性城市;采用的新空间识别方法主要是标准设定识别法,操作简单,但主观性较强,以定性描述居多;识别出的新空间以地级行政单位为基础单元,这对于进一步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制定和实施区域空间发展总体战略的指导作用有限。鉴于此,本文借鉴现有文献中关于问题区域和某些特殊类型区域的识别方法,将标准设定识别与定量分析方法有机结合,在剖析区域发展新空间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识别以城市群或都市圈等为基础单元的区域发展新空间。

二、区域发展新空间的内涵与特征

(一) 区域发展新空间的内涵

科学界定区域发展新空间的内涵是新空间识别的前提和关键。本文的研究基于安树伟等^[12]提出的概念,即区域发展新空间是对全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资源环境保障能力强、经济规模较大、辐射带动作用较强、经济发展动力充足、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能够集聚更多的人口和产业,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育和发展,可以有效地推进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关键区域。区域发展新空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上看,区域发展新空间主要指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点承载区域,同时也是中国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总量扩张的主要区域。从广义上看,区域发展新空间不仅包括狭义的新空间,还包括高度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地区,以及未来15~35年支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潜在新空间和海洋空间。

区域发展新空间大体可以分为3种类型:一是第一代区域发展空间,指经历了一段时期经济快速增长后处于高度发达但发展速度趋于缓慢的地

区,这些地区可以通过转型升级、结构优化和功能提升等方式释放新的发展空间;二是第二代区域发展空间,即狭义的区域发展新空间,是未来 15 年左右推进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引领区域和带动区域,也是推进国家区域战略调整的主导力量;三是第三代区域发展空间,也称为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指当前经济增长速度快、发展动力较足但经济规模较小的地区,包括海洋空间。第三代区域发展空间是第二代区域发展空间的接替区域,是未来 15~35 年支撑中国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重要区域。

(二) 区域发展新空间的特征

广义的区域发展新空间具有战略性、带动性、梯次性、层次性、多维性 5 个基本特征^[12]:新空间对全国经济增速有较大的贡献,是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区域;是支撑全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同时对周边地区发展具有很强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同类型的新空间,无论是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还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时间段,都是梯次推进的;新空间既有全国层面又有城市群层面的,还有省域及地级市层面的,不同层次的新空间战略重点有所不同;新空间既包括内涵式的也包括外延式的,还有可能是内涵与外延并重的。

与第一代、第三代区域发展空间相比,第二代区域发展空间又具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承上启下性。主要体现为,第二代区域发展空间不仅需要接替第一代区域发展空间的支撑作用,还需要带动第三代区域发展空间即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尽快成长。二是空间集聚性。从空间形态看,第二代区域发展空间是发育较为成熟的城市群,发育程度和发展水平尚低于东部沿海地区三大城市群,但近年来发展迅速,城市群空间结构表现出较强的轴线发展特征,且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强。三是增长动力强劲。第二代区域发展空间兼备第一代、第三代发展空间的优点,不仅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拥有由较高的创新能力、快速推进的新型城镇化等因素形成的充足的经济增长动力。四是环境容量大。第二代区域发展空间尚未经过大规模、高强度的经济开

发,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程度较低,且拥有较为充足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要害资源,发展条件优越,具有足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支撑其经济持续发展。

三、研究方法数据来源

区域发展新空间识别过程中,采用熵值法对城市经济增长动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指标权重赋值,熵值法通过信息熵原理确定权重,能够反映出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避免信息重复^[13-14]。参照王欣等^[15]、侯赞慧等^[16]的研究,采

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 $R_{ij} = k_{ij} \frac{\sqrt{P_i GDP_i} \sqrt{P_j GDP_j}}{D_{ij}^2}$

计算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模型中, R_{ij} 为城市 i 和城市 j 的经济联系, $k_{ij} = \frac{GDP_i}{GDP_i + GDP_j}$ 为修正系数, P_i 和 P_j 为两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数,本文选择客流量最大的公路营运里程作为城市间的距离。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3—2018),2017 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数据来源于各地级市《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地级市单位矢量化边界来自 2017 年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1:100 万分地级市行政区划数据库(包含台湾岛、钓鱼岛、南海诸岛、国界及九段线等)。

四、区域发展新空间的识别

(一) 经济增长速度快的区域识别

区域发展新空间首先应该是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区域。为了避免由偶然因素引起的经济增长异常变动的影响,同时又能反映现阶段经济增长速度,分别计算了 2014—2017 年、2012—2017 年两个时间段内全国 28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以及 2017 年 287 个城市的经济增长率。2014—2017 年、2012—2017 年年均经济增长率和 2017 年经济增长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城市有 127 个;2014—2017 年、2012—2017 年年均经济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 2017 年经济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城市有 12 个;2014—2017 年年均经济增长率、2017 年经济增长率高于平均

水平,但 2012—2017 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低于平均水平的城市有 10 个;2012—2017 年年均经济增长率、2017 年经济增长率高于平均水平,但 2014—2017 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低于平均水平的城市有 4 个。上述 4 种类型的城市共 153 个,被识别为经济增长速度快的区域。总体上,经济增长速度快的城市集中分布在长三角、粤港澳、山东半岛、海峡西岸、武汉、长株潭、关中平原、成渝、中原等城市群(都市圈)地区,广西、云南、贵州、宁夏等省份增长速度快的城市较多,京津冀、东北地区以及山西、甘肃等资源型地区也有少量增速快的城市。

(二)经济增长动力足的区域识别

经济增长动力充足是区域发展新空间的另一个重要特性。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要素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主要通过提高整体投入效率推动经济增长^[17]。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与实践,SOLOW^[18]最先指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要素,随后一些学者尝试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为经济增长模型,明确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逐步形成了新经济增长理论^[19]。国内学者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变迁能够带来“结构红利”,进而有效促进经济增长^[20];除了要素投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21];对外贸易和金融改革均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22];创新驱动效应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中十分明显,但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23]。另外,从需求层面看,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无疑是短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每个城市经济增长动力的大小存在差异,且在不同发展阶段推动其增长的主导因素也有所不同。为了测度各个城市的经济增长动力,从而识别动力充足的区域,参照孙丹等^[3]关于中国主要城市群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从产业升级、需求拉动、创新驱动、城市引导 4 个方面构建了城市经济增长动力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 2017 年全国 28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相关数据,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到了各指标的权重(见表 1)。

表 1 城市经济增长动力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动力系统	具体指标	单位	权重
产业升级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	0.011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	0.021
	第二产业结构变动系数	-	0.004
	第三产业结构变动系数	-	0.003
需求拉动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	%	0.004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	0.007
	人均净出口总额	美元/人	0.287
创新驱动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从业人员数	人	0.232
	万人拥有的专利申请授权量	件	0.165
	科学技术支出占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	%	0.072
城市引导	市辖区人均 GDP	元/人	0.038
	市辖区人口占全市人口比重	%	0.060
	市辖区建成区面积	km ²	0.096

在城市经济增长动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其各指标权重确定的基础上,计算了 2017 年全国 28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增长动力综合得分和各动力系统得分,综合得分平均值为 0.093。全国 287 个城市中 81 个城市的经济增长动力综合得分高于平均水平,这些高于平均水平的城市被识别为经济增长动力足的区域。经济增长动力充足的城市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动力充足的城市在沿海地区集中连片分布,而在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则呈点状分散分布,且大多为各省份的省会(自治区首府);第二,沿海地区城市的综合得分整体上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的得分。从各动力系统得分看,东部沿海地区大多数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以创新驱动为主,部分城市通过创新和需求两方面因素共同驱动,少数城市以需求拉动为主,且需求拉动中“人均净出口额”指标得分的比重占 90% 以上;中部地区城市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作用相对较大,城市引导作用明显;西部地区多数城市经济增长中产业升级的相对重要性较大。

(三)以地级市为基本单元的区域发展新空间

全国 28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被识别为经济增长速度快的城市 153 个,被识别为经济增长动力足的城市 81 个,同时被识别为增长速度快和动力足的城市 59 个。重点考虑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动力两个维度,结合城市所在的区域范围,从上述 59 个城市中识别以地级市为基本单元的区域发展新

空间。按照经济增长速度的排序^①,将 153 个增速快的城市分为甲、乙两个层次,甲为排序位于前 1/2 的城市,乙为排序后 1/2 的城市。同样,按照经济增长动力综合得分的排序,将 81 个动力足的城市分为 A、B、C、D 4 个层次,A 为排序 1~20 的城市,B 为排序 21~40 的城市,C 为排序 41~60 的城市,D 为排序 61~81 的城市。根据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动力综合得分划分的层次,建立区域发展新空间的识别标准。具体地,第一代区域发展空间指经济增长动力综合得分排名最靠前但增速排序位于后 1/2 的“A 乙型”型城市,或者是东部地区的“A 甲型”城市;第二代区域发展空间即狭义的区域发展新空间,包括非东部地区的“A 甲型”城市、“B 甲型”城市、东部地区的“B 乙型”和“C 甲型”城市;第三代区域发展空间即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指非东部地区的“C 甲型”和“D 甲型”城市(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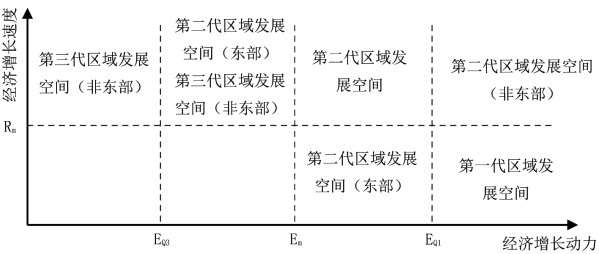


图 1 以地级市为基本单元的区域发展新空间识别标准
注: R_m 表示 153 个增速快的城市的中位数; E_{Q1} 、 E_m 、 E_{Q3} 分别表示 81 个经济增长动力足的城市的第一四分位数、中位数和第三四分位数的相对发展动能。

根据构建的以地级市为基本单元的区域发展新空间识别标准,最终从 59 个经济增长速度快且动力足的城市中识别出 41 个以地级市为基本单元的新空间。其中,第一代区域发展空间 14 个,第二代区域发展空间 21 个,第三代区域发展空间 6 个(见表 2)。

(四) 区域发展新空间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

除了具备充足的经济增长动力和快速的增长速度外,区域发展新空间还必须有足够的资源环

表 2 以地级市为基本单元的区域发展新空间

新空间类型		城市	经济增长速度及其排序				经济增长动力综合得分及其排序	
			2017 年 增速 /%	排 序	2012—2017 年 年均增速 /%	排 序	得分	排 序
第一代 区域 发展 空间	A 乙型	北京	9.14	123	9.40	90	0.545	2
		东莞	11.05	88	8.64	119	0.454	3
		上海	8.71	131	8.70	114	0.384	5
		广州	10.01	109	9.67	79	0.383	6
		苏州	11.92	63	7.59	141	0.347	8
		厦门	14.98	17	9.08	104	0.230	9
		佛山	8.91	126	7.28	145	0.272	14
		宁波	13.36	39	8.39	126	0.233	18
		无锡	14.13	29	6.79	148	0.223	19
	东部 A 甲型	深圳	15.11	16	11.62	20	0.705	1
		惠州	12.26	58	10.10	55	0.418	4
		珠海	20.16	5	12.21	13	0.369	7
		杭州	10.98	89	9.98	61	0.284	11
		南京	11.54	70	10.22	52	0.278	13
第二代 区域 发展 空间	非东部 A 甲型	武汉	12.57	55	10.87	37	0.243	15
		成都	14.13	30	11.28	27	0.239	16
		西安	19.41	6	11.34	23	0.237	17
		重庆	9.49	118	11.23	30	0.217	18
	B 甲型	常州	14.69	20	10.78	39	0.204	21
		合肥	11.61	68	10.96	36	0.180	23
		郑州	13.31	42	10.62	42	0.169	25
		长沙	9.12	124	9.79	73	0.160	29
		昆明	12.97	48	10.04	58	0.143	38
	东部 B 乙型	湖州	8.39	135	8.27	131	0.139	40
		威海	8.34	136	8.28	130	0.149	35
		青岛	10.25	102	8.61	120	0.151	33
		镇江	4.60	151	8.80	113	0.152	32
		嘉兴	13.42	38	8.67	115	0.160	30
		济南	10.19	104	8.44	124	0.165	26
	东部 C 甲型	扬州	13.83	32	11.54	21	0.137	44
		汕头	12.97	47	10.53	44	0.133	47
		福州	14.62	21	10.99	34	0.133	48
		南通	14.28	27	11.15	33	0.131	49
		海口	10.56	96	11.17	32	0.125	52
		三亚	11.41	74	9.87	69	0.115	60
第三代 区域 发展 空间	非东部 C 甲型	贵阳	12.04	62	15.78	4	0.136	45
		兰州	11.45	73	10.04	57	0.125	53
		鄂州	13.55	36	10.08	56	0.123	54
	非东部 D 甲型	银川	11.47	71	9.88	68	0.114	62
		南宁	11.22	81	10.47	46	0.105	67
		襄阳	10.03	108	10.19	53	0.100	73
全国平均水平		8.42	—	7.71	—	0.093	—	

资料来源:2013—2018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地级市《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境承载力支撑其经济持续发展。土地和水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最基本的两类资源^[11],鉴于数据可

① 指 153 个经济增长速度快的城市按照 2012—2017 年年均经济增长率和 2017 年经济增长率的排序。当某城市的两种排序不属于同一类别时,以 2012—2017 年年均经济增长率的排序为准。

得性,采用工业用地比重和人均供水能力来衡量以地级市为基本单元的新空间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工业用地比重指市辖区工业用地面积占市辖区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比重,现有工业用地比重越高,表明未来发展的土地约束越大。人均供水能力指城市供水综合生产能力与用水人口的比重,供水能力大则意味着水资源约束小。41 个以地级市为基本单元的区域发展新空间中,24 个城市的市辖区工业用地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1 个城市的人均供水能力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 3)。总体来看,第一代区域发展空间市辖区工业用地比重偏高,表明其未来发展的土地资源约束较大,迫切需要提高工业用地使用效率,第二代区域发展空间和第三代区域发展空间土地资源约束相对较小。从人均供水能力看,第三代区域发展空间人均供水能力整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水资源硬约束问题突出,第一代区域发展空间的供水能力最大,水资源约束最小。

表 3 2018 年以地级市为基本单元的区域发展新空间的资源环境承载力

发展空间	城市	市辖区 工业用地 比重/%	人均供水 能力 /m ³ /d·人	发展空间	城市	市辖区 工业用地 比重/%	人均供水 能力 /m ³ /d·人
第一代 区域 发展 空间	北京	17.88	1.72	第二代 区域 发展 空间	武汉	25.21	0.58
	东莞	35.84	0.56		成都	16.42	0.47
	上海	28.83	0.52		西安	12.12	0.37
	广州	26.84	0.60		重庆	19.86	0.42
	苏州	27.21	1.16		常州	33.17	1.02
	厦门	24.31	0.49		合肥	17.87	0.48
	佛山	27.96	1.87		郑州	8.63	0.31
	宁波	34.02	0.62		长沙	9.75	0.63
	无锡	23.92	0.85		昆明	12.12	0.51
	深圳	29.10	0.54		湖州	25.27	0.59
	惠州	25.52	0.59		威海	27.39	0.50
	珠海	30.90	0.58		青岛	29.99	0.47
	杭州	15.50	0.67		镇江	27.27	0.68
	南京	21.06	0.99		嘉兴	19.92	0.69
第三代 区域 发展 空间	平均	26.35	0.84		济南	18.87	0.58
	贵阳	17.41	0.53		扬州	21.77	0.99
	兰州	15.77	0.73		汕头	12.35	0.47
	鄂州	23.24	0.63		福州	13.84	0.64
	银川	9.56	0.29		南通	26.93	2.28
	南宁	6.18	0.50		海口	6.53	0.35
	襄阳	28.94	0.72		三亚	5.13	0.98
全国平均水平	平均	16.85	0.57		平均	18.59	0.67
	全国平均水平	19.66	0.62	-	-	-	-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2018》。

工业用地比重和人均供水能力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发展新空间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但是考虑到中国工业用地效率还存在很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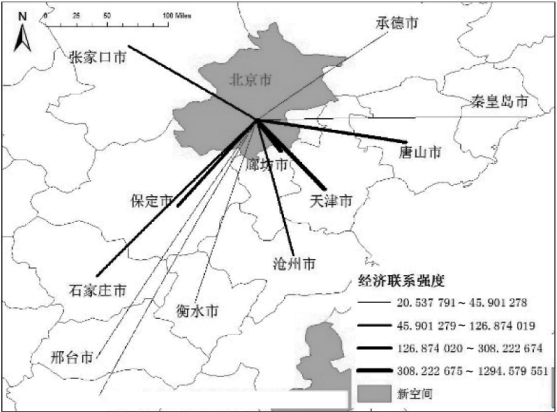
提升空间,人均供水能力也可以通过跨区域调配得以提高^[11],本文只是对已识别出新空间的承载力做了评价,并未将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新空间识别的标准。当然,区域发展新空间在发展过程中应高度重视自身的承载力。

(五)以城市群(都市圈)等为基本单元的区域发展新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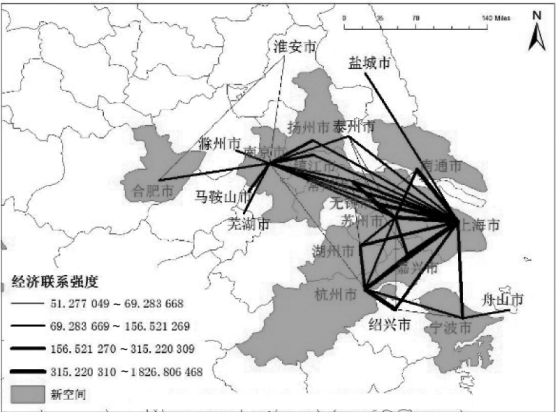
城市群和都市圈是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两个阶段的表现形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进一步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市群已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因此,区域发展新空间的拓展不能以城市为基本单元,而应以城市为基础进一步识别出以城市群为基本单元的新空间。考虑到部分城市群规划面积过大、城市间联系程度低,事实上还处于都市圈形成阶段,故部分新空间以都市圈为基本单元。

利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计算 2017 年以地级市为基本单元的区域发展新空间与其周边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见图 2),以此确定新空间的区域影响范围,结合以地级市为基本单元新空间的类别和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进而最终识别以城市群或都市圈等为基本单元的新空间及其类型(见表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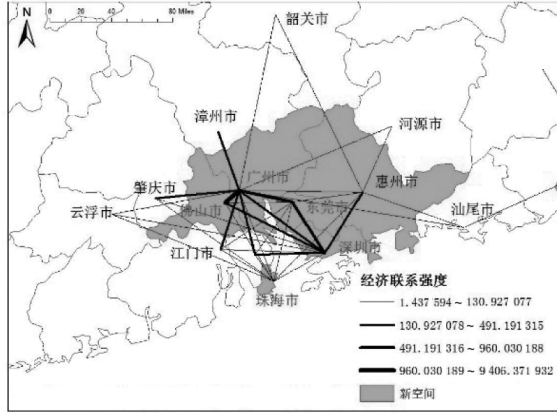
京津冀城市群内,北京被识别为第一代区域发展空间,与城市群内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较大。天津和石家庄市虽然经济增长速度慢,但增长动力充足,2017 年这两个城市经济增长动力综合得分在全国 287 个城市中排名分别为第 12 位和第 70 位。京津冀城市群发育较为成熟、开发程度高,2014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综合考虑,将该城市群整体识别为第一代区域发展空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内,上海、南京、杭州、宁波、无锡、苏州被识别为第一代区域发展空间,湖州、合肥、常州、扬州、南通、镇江、嘉兴被识别为第二代区域发展空间,绍兴、舟山、金华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增长动力高于平均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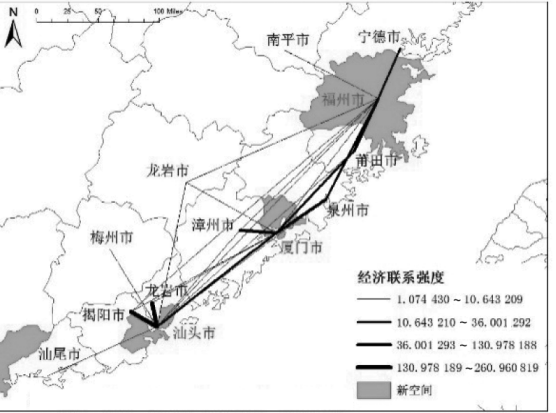
a. 北京与其周边城市经济联系强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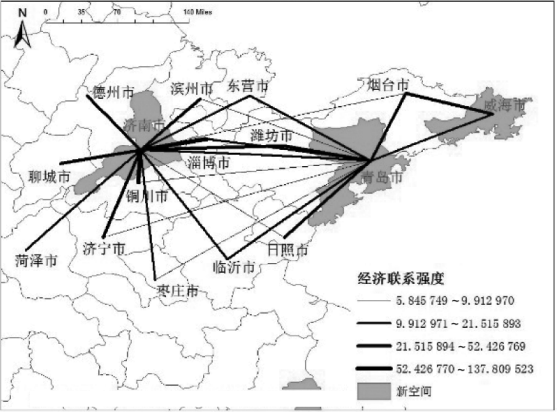
b. 上海、杭州、合肥等与其周边城市经济联系强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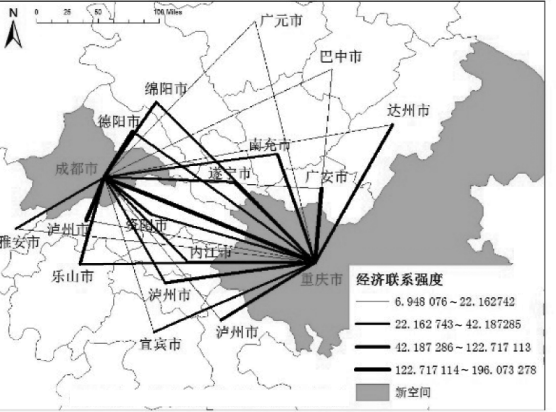
c. 广州、深圳、珠海等与其周边城市经济联系强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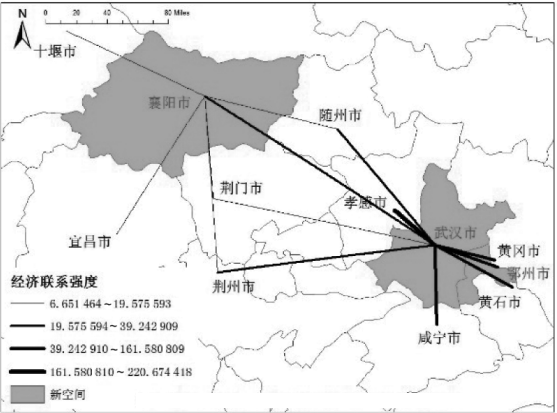
d. 福州、厦门、汕头与其周边城市经济联系强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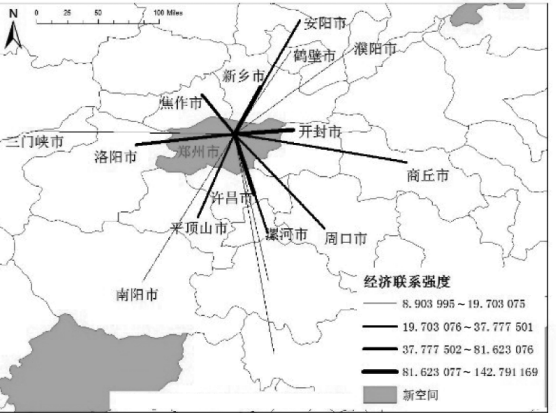
e. 济南、青岛、威海与其周边城市经济联系强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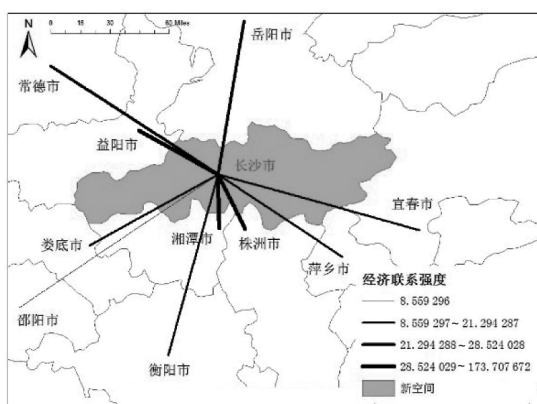
f. 重庆、成都与其周边城市经济联系强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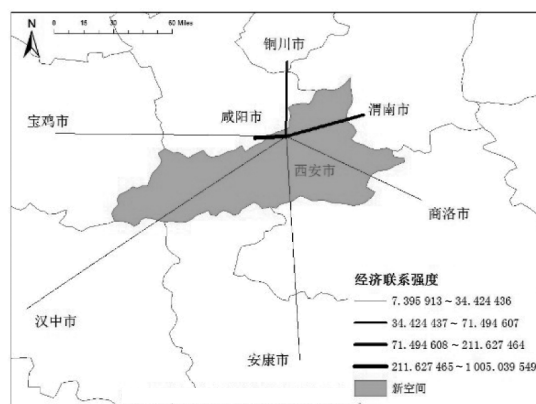
g. 武汉、襄阳、鄂州与其周边城市经济联系强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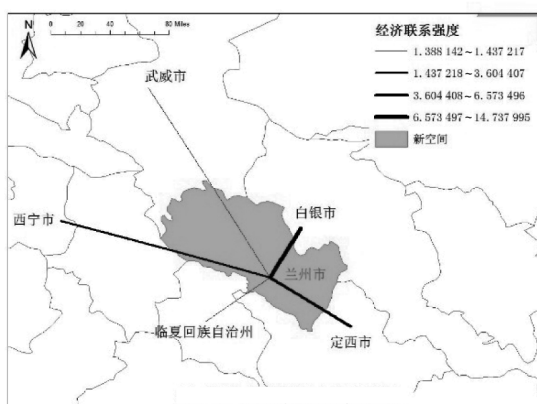
h. 郑州与其周边城市经济联系强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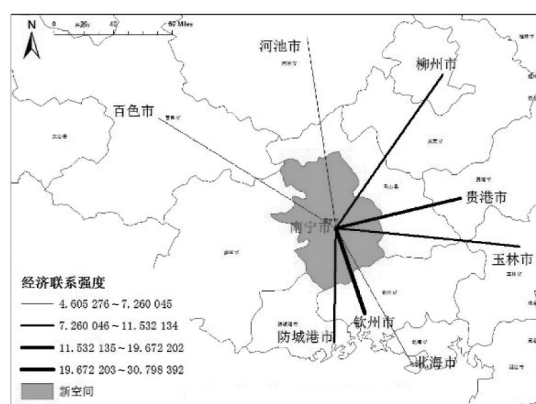
i. 长沙与其周边城市经济联系强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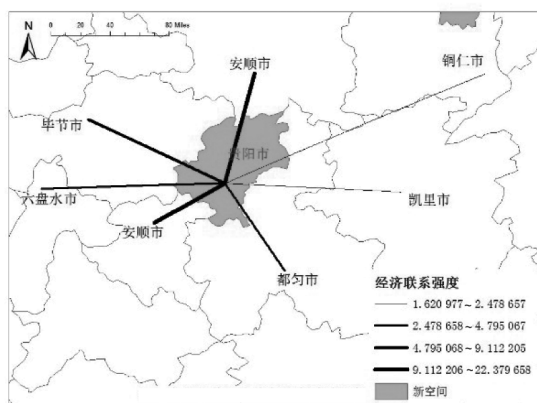
j. 西安与其周边城市经济联系强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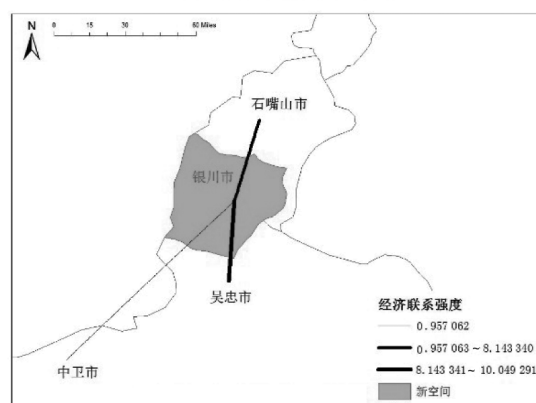
k. 兰州与其周边城市经济联系强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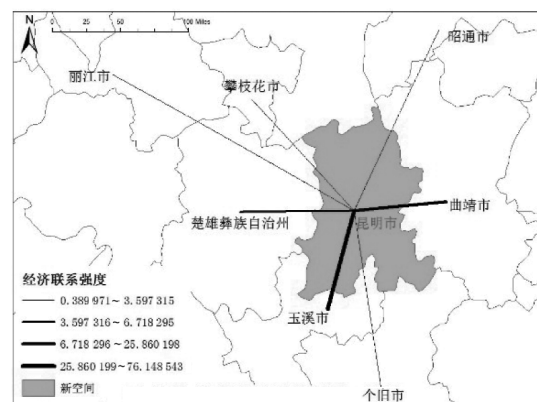
l. 南宁与其周边城市经济联系强度



m. 贵阳与其周边城市经济联系强度



n. 银川与其周边城市经济联系强度



o. 昆明与其周边城市经济联系强度

图2 2017年以地级市为基本单元的区域发展新空间与其周边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

表 4 以城市群(都市圈)等为基本单元的
区域发展新空间及其范围

区域发展空间		范围
第一代区域发展空间	京津冀城市群	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秦皇岛、邯郸、邢台、保定、张家口、承德、沧州、廊坊、衡水
	长三角城市群	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泰州、盐城、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湖州、金华、绍兴、舟山、台州、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
	粤港澳大湾区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肇庆、惠州
第二代区域发展空间	海峡西岸城市群	福州、厦门、莆田、泉州、漳州、宁德
	成渝城市群	重庆、成都、自贡、泸州、德阳、绵阳、遂宁、内江、乐山、眉山、广安、资阳
	山东半岛城市群	济南、青岛、淄博、东营、烟台、潍坊、威海、德州、滨州
	长株潭城市群	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益阳、娄底
	武汉城市群	武汉、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天门、潜江、仙桃
	中原城市群	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新乡、焦作、许昌、漯河、济源
	关中平原城市群	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
第三代区域发展空间	辽中南城市群	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营口、辽阳、盘锦
	滇中地区	昆明、曲靖、昭通、玉溪、普洱、保山
	黔西北地区	贵阳、遵义、安顺、六盘水
	太原都市圈	太原、晋中
	晋陕蒙交界地区	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巴彦淖尔、乌兰察布、大同、朔州、榆林
	湘粤桂交界地区	韶关、清远、河源、桂林、柳州、怀化、邵阳、永州、郴州
	淮海经济区	连云港、徐州、淮安、宿迁、枣庄、济宁、菏泽、商丘、淮北
	汉江中上游地区	陇南、巴中、汉中、安康、十堰、随州、襄阳
	北部湾—西江中游地区	南宁、钦州、贵港、玉林、崇左、北海、防城港、湛江、茂名、阳江
	兰州及其周边地区	兰州
	银川及其周边地区	银川
第二代区域发展空间的后备区域	哈尔滨都市圈	哈尔滨、松原、绥化
	长春都市圈	长春、辽源、四平、吉林、铁岭
第三代区域发展空间的后备区域	兰州都市圈内除兰州外地区	白银、临夏回族自治州、定西、武威、海东
	银川都市圈内除银川外地区	石嘴山、吴忠、乌海、阿拉善盟
	新疆沿边地区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西藏“一江三河”地区	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

平。因主要城市被识别为第一代区域发展空间,且与城市群内其他城市经济联系强度大,故将其整体识别为第一代区域发展空间。粤港澳大湾区

内,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被识别为第一代区域发展空间,中山经济增长速度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 2017 年增长动力综合得分在全国 287 个城市中排名第 10 位。因主要城市均被识别为第一代区域发展空间,且与区内其他城市经济联系强度大,故将其整体识别为第一代区域发展空间。

海峡西岸城市群,厦门被识别为第一代区域发展空间,福州和汕头被识别为第二代区域发展空间,新空间与周边城市经济联系强度较大,将其整体识别为第二代区域发展空间。山东半岛城市群的济南、青岛、威海被识别为第二代区域发展空间,成渝城市群的成都和重庆被识别为第二代区域发展空间,且被识别为新空间的城市与城市群内其他城市经济联系强度较大,因此将两者整体识别为第二代区域发展空间。武汉、郑州、长沙、西安被识别为第二代区域发展空间,这些城市与其周边城市经济联系强度较大,因此把分别以武汉、郑州、长沙、西安为核心的武汉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整体识别为第二代新空间。

昆明虽然被识别为第二代区域发展空间,但其与周边城市经济联系强度不大,以昆明为核心的滇中城市群发育尚未成熟,故将滇中地区整体识别为第三代区域发展空间。贵阳被识别为第三代区域发展空间,与周边城市经济联系强度小,以贵阳为核心的黔中城市群发育尚未成熟,故将黔西北地区识别为第三代区域发展空间。兰州、银川、南宁被识别为第三代区域发展空间,这些城市的区域影响范围小,与周边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小,分别以兰州、银川、南宁为核心的兰(州)西(宁)地区、宁夏沿黄地区、北部湾地区核心城市发育程度较低,够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群。考虑到甘肃国土面积偏大且经济发展水平低,兰州又受到城市发展空间的限制辐射带动作用有限,近期内先把兰州及其周边地区识别为第三代区域发展空间,把兰州都市圈内其他地区作为第三代区域发展空间的后备区域。宁夏国土面积偏小,加之银川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偏弱,近期内

先把银川及其周边地区识别为第三代区域发展空间,把银川都市圈内其他地区作为第三代区域发展空间的后备区域。以南宁为核心的南宁都市圈与处于广西、广东交界地带的西江中游地区部分区域出现重合,且南宁都市圈内的河池、百色位于西江上游,应主要发挥生态涵养功能,不宜进行大规模经济开发。因此,将南宁、崇左、防城港、贵港、钦州、北海、玉林、湛江、茂名、阳江统称为北部湾—西江中游地区,整体识别为第三代区域发展新空间。

除此之外,考虑到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是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且辽宁省的沈阳、大连虽然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增长动力仍较为充足,因此将以沈阳和大连为核心、发育较成熟的辽中南城市群整体识别为第二代区域发展空间。黑龙江的哈尔滨、吉林的长春经济增长动力相对充足,但鉴于其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且哈尔滨都市圈、长春都市圈发育程度较低,近期内将这两个都市圈作为第二代区域发展空间的后备区域。山西和内蒙古是典型的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波动幅度较大,资源型经济特征明显,目前经济增长动力尚为充足,但增长速度放缓,亟需培育新的发展能力。综合考虑将太原都市圈、以呼和浩特和包头为核心的晋陕蒙交界地区识别为第三代区域发展空间。为了促进省际交界区域进一步发展,将湘粤桂交界地区、淮海经济区、汉江中上游地区识别为第三代区域发展空间。柳州是广西北部部的工业重镇,且与桂林相邻,在湘粤桂交界区域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考虑到省际交界区域的完整性,把柳州一并纳入湘粤桂交界区域。基于维护国家稳定、巩固民族团结和边疆安全等因素,新疆及其沿边地区、西藏“一江三河”地区也是新空间识别中需要重点考虑的区域,但乌鲁木齐与新疆沿边的两个州没有形成集中连片区域,西藏“一江三河”地区海拔太高,发展条件受到很大限制。因此,近期内只把乌鲁木齐及其周边地区识别为第三代区域发展空间,把新疆沿边地区和西藏“一江三河”地区作为第三代区域发展空间的后备区域。

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确定的城镇化地区相比,本文识别的区域发展新空间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主要城市化地区基本一致,但新空间的范围更加精确、细化,并且考虑了省际交界地区、沿边地区、流域等特殊的区域。本文识别的第一代区域发展空间正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要优化提升的东部地区城市群,规划指出要培育发展的成渝、中原、长江中游、哈长等中西部地区城市群中,成渝、中原、长江中游城市群被本文识别为第二代区域发展空间,哈长城市群则被识别为第二代区域发展空间的后备区域。

五、结论与启示

在界定区域发展新空间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将标准设定识别与熵值法、引力模型等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以全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综合考虑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动力、资源环境承载力、城市间经济联系等因素,按照统筹东中西和协调南北方、空间连续性、政策延续性、战略支撑作用明显等原则,最终识别出的第一代区域发展空间包括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第二代区域发展空间包括海峡西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第二代区域发展空间的后备区域包括哈尔滨都市圈、长春都市圈;第三代区域发展空间包括滇中地区、黔西北地区、太原都市圈、晋陕蒙交界地区、湘粤桂交界地区、淮海经济区、汉江中上游地区、北部湾—西江中游地区、兰州及其周边地区、银川及其周边地区、乌鲁木齐及其周边地区,第三代区域发展空间的后备区域包括兰州都市圈内除兰州外的其他地区、银川都市圈内除银川外的其他地区、新疆沿边地区、西藏“一江三河”地区。

未来,第一代区域发展空间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第一代发展空间包括发育相对成熟处于第一梯队的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这些地区曾支撑了中国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长。下一步的发展要以内涵式增长为主,打造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推进城市群的结构优化,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第二代区域发展空间以空间结构优化和产业功能提升为主。现阶段的第二代发展空间主要是一些处于快速成长阶段、但尚未发育成熟的城市群,是承接第一代区域发展空间产业转移、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引领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空间载体。下一步发展要以自身“做大做强”为主,加快打造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基地,推进城市群功能提升,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兼顾结构优化。第三代区域发展新空间培育发展能力为主。第三代发展空间是中国战略性资源富集区、对外开放新门户以及维护国家稳定、巩固民族团结、保障边疆安全的重要区域。下一步的发展中,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促进新旧动能转换。

参考文献:

- [1] 龚勤林,邱萍. 问题区域识别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 探索,2011(4):174-178.
- [2] 王婧,刘奔腾,李裕瑞. 京津冀地区人口发展格局与问题区域识别[J]. 经济地理,2017,37(8):27-36.
- [3] 孙丹,欧向军,朱斌城,等. 中国主要城市群经济增长动力分析及其问题区域识别[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8,34(1):71-77.
- [4] 时卫平,龙贺兴,刘金龙. 产业准入负面清单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问题区域识别[J]. 经济地理,2019,39(8):12-20.
- [5] 段华平,孙勤芳,王梁,等. 常熟市农业和农村污染的优先控制区域识别[J]. 环境科学,2010,31(4):911-917.
- [6] 张倩,胡云锋,刘纪远,等. 基于交通、人口和经济的中国城市群识别[J]. 地理学报,2011(6):761-770.
- [7] 高晓路,季珏,樊杰. 区域城镇空间格局的识别方法及案例分析[J]. 地理科学,2014,34(1):1-9.
- [8] 虞虎,钟林生,曾瑜哲. 中国国家公园建设潜在区域识别研究[J]. 自然资源学报,2018,33(10):1766-1780.
- [9] 潘方杰,王宏志,宋明洁,等. 基于 GIS 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空间识别研究——以湖北长阳县为例[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54(4):658-631,669.
- [10] 安树伟. 培育中国经济新战略区域[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10-14(4).
- [11] 侯永志,张永生,刘培林,等. 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战略性区域研究[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4-6,30-41,116-118.
- [12] 安树伟,肖金成. 区域发展新空间的逻辑演进[J]. 改革,2016(8):45-53.
- [13] 欧向军,甄峰,秦永东,等. 区域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及其理想动力分析——以江苏省为例[J]. 地理研究,2008,27(5):993-1002.
- [14] 王富喜,毛爱华,李赫龙,等. 基于熵值法的山东省城镇化质量测度及空间差异分析[J]. 地理科学,2013,33(11):1323-1329.
- [15] 王欣,吴殿廷,王红强. 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定量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2006(3):55-59.
- [16] 侯赞慧,刘志彪,岳中刚.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社会网络分析[J]. 中国软科学,2009(12):90-101.
- [17] HARROD R F. An essay in dynamic theory [J]. Economic journal,1939(49):14-33.
- [18] SOLOW R M.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7,39(3):312-320.
- [19] ROMER P M.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71-102.
- [20] 于春晖,郑若谷,余典范.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 经济研究,2011(5):4-16,31.
- [21] 丁志国,赵宣凯,苏治. 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基于资源配置效率的产业升级方向与路径选择[J]. 中国工业经济,2012(9):18-30.
- [22] 何其春,孙萌. 对外贸易、金融改革和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证据[J]. 经济学(季刊),2012(3):833-852.
- [23] 陶长琪,彭永樟. 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制度质量视角下的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与路径选择[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7):3-21.

(本文责编:王延芳)